

# 回归先贤 升华先贤

## ——简论郑观应的向西方学习

林刚

鸦片战争，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着一个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冷兵器远不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屡战屡败，丧权侮国。向来行之有效的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章典制度、思想观念，在资本主义工业为后盾的列强武力打击下，在解决中华民族生死攸关问题上一时全然失效。正如李鸿章所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又以成法制之。”<sup>①</sup>历史巨变，不能不引致中国人在观念上的翻天覆地的震动，同时引发朝野有识人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省乃至革命性的全新思维。

在这场新思潮的革命性变动中，不同的地位、背景、政治立场和文化素养的人士有着认知上的相同和相异，人们往往将其划为不同的思想派别，但无论个中差别多大，郑观应思想、理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它对中国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一、郑观应的“向列强学习”的根本原则和出发点是反抗侵略，是救国。他首先是一个极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是其爱国和反侵略政治立场的产物。他又是一位对新鲜事物十分敏感、勤于思考并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谙熟“洋人”和“洋务”。这些，使他的“向西方学习”具有几个鲜明特征：全面系统性；深刻科学性；时刻不忘“老师”的侵略本性，没有丝毫崇洋媚外之气，又充满为国

家强盛而排除万难的决心。

《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可看作郑观应向西方学习的三个发展阶段<sup>②</sup>，明确反映出郑观应学习西方的基本精神和特点。

早在1860年代，当郑观应还是二十来岁的青年时，就对列强从澳门贩卖中国人去美洲当奴隶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怒目喝斥洋人在中国领土上的横行霸道：“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岂以我华人孱弱无妨任意残暴乎！”<sup>③</sup>但从《救时揭要》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郑观应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愤怒和不满，并无明确向西方学习的意识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中国是否宜开金矿问题上，郑观应认为：外邦日开金矿，亦不见富国，我国素称富厚，又何须此末技乎？<sup>④</sup>显见郑观应对中国面临的大变革问题尚很模糊。

随着对列强侵略行径认识的深化，随着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种种不足的反思的深化，郑观应向西方学习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充分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受列强侵略欺侮的境地，就必须民富国强，而在新形势下，要民富国强只能向西方列强学习。郑观应自觉融入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sup>⑤</sup>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

《易言》一书鲜明反映了这一点。

和《救时揭要》截然不同，在成书于1875年的《易言》36篇的“自序”中，郑观应明确提出，对西方列强要“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36篇中，以学习西方为主要内容者有“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论邮政”、“论议政”、“论考试”、“论边防”、“论水师”、“论火器”、“论练兵”等；对照西法以

批评或改革国内制度、问题者有“论公法”、“论税务”、“论开垦”、“论铸银”等多篇，两者占了全书内容的绝大部分。仅以开矿问题而论，郑观应认为，“居今日而策国家之富强，资民生之利赖，因地之利，取无尽而用不竭者，其惟开矿一事乎！”<sup>⑥</sup>这与十余年前他对开矿的认识已有天壤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之所以发生如此大转变，是因为中国在反击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不断失利，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而中外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弱对比愈益明显。诚如郑观应所说，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输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sup>⑦</sup>总之，岌岌可危之局迫使中国须立即改革陈法，向西方学习，迅速维新。在当时，改革、学习和维新，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装备、技术和生产方法，所谓兴办车、船、路、矿。而郑观应在《易言》中，虽也谈及议政、吏治、考试等，但主要注意力也还是放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层面上的，目标是“强兵”，因为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是国防和军事问题。在《易言》中郑观应一再强调疆域危机和强兵的急迫性：“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也。”<sup>⑧</sup>“经世之道，保民莫先于富国，保富莫要于强兵。”<sup>⑨</sup>

1890年代前后，中国民族危机到了新阶段。自《易言》发表19年后，“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西藏、朝鲜危同累卵。而我国工艺之精，商务之盛，瞠乎于日本。”郑观应的思想敏锐和对中外形势的深入洞察，使他对仅仅局限于军备、技术层面的学习西方产生了极大疑问。早于许多人，在30年洋务新政的主要代表海军于甲午被击败之前，郑观应的向西方学习观念就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大大加深了对中西双方的利弊兴衰的研究，同时也对西方侵略者的本性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些鲜明体现在成书于1894年的《盛世危言》中。《盛世危言》较之《易言》在向西方学习的理念中又有了明显发展。认为“今夫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思格致，犹之琢玉无刀

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sup>⑩</sup>将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放到了富国强兵，救国保民的极重要的位置。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表达了几个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重要思想。

第一，总结60年来与外国打交道的经验教训，认为向西方学习，不能只学习外表和形式即“用”，而应学习其强盛的本源即“体”或“本”。他所谓的“西学之本”，第一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即议院体制的建立。他说“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甲午战败后，他更是大声疾呼“中国当此危急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自强非变法不可。”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sup>⑪</sup>“第二是科学。他归之于天学、地学、人学，具有深刻的内涵，实质上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近代科学。“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演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艺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sup>⑫</sup>如果只知进口和模仿外国技术设备，不研究发生技术的理论，那么即使是西方富强之道的“用”也是学不来的：“年来当道讲求洋务，亦曾造枪炮，设电线，建铁路，开矿、织布以起而应之矣。惟所用机器，所聘工师，皆来自外洋。上下因循，不知通变……”<sup>⑬</sup>郑观应的西学观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他认识并提出了中国积弱、西方富强的政治体制和科学这两个根本点。

第二，全面系统性。郑观应的西学观之一大特点是全面系统性。在《盛世危言》中，他对照中、西，提出需要变革之处，除议院和科学两个关键问题外，还涉及教育（包括女子教育）、考试、藏书、公举、日报、吏治、典礼、公法、通使、禁烟、传教、条约、入籍、廉奉、限仕、汰冗、建都、户口、教养、训俗、刑法、狱囚、巡捕、罚赎、医道、善举、僧道、税则、厘捐、捐纳、漕运、盐务、度支、国债、商务、商战、商船、保险、铁路、电报、邮政、驿站、银行、铸

银、开矿、纺织、技艺、农业、治河、海防、边防、练兵、练将、水师、船政、民团、火器、间谍等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国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法制、行政、财政、医学、外交、外贸、民政等领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机联系起来。这不仅在当时极为可贵，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事业也极有启发。

第三，以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向西方学习，坚决摒弃妄自菲薄情绪；无论西方多么先进，学习西方的落脚点只能是中国。最终要达到中国的真正富强，而绝不是将中国变成外国附庸。郑观应说：“夫所贵乎通儒者，薄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慑他人；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sup>⑭</sup>。郑观应又说：“从事西文西学固为知儿之士，识时之杰，然必以我本国文字学问为始基，而后能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sup>⑮</sup>郑观应在论西学时，总是强调西学的格致之学源于中国古代学术，今天看来是牵强和谬误的，但在当时，这可能与郑氏希望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时保持民族精神有关。他说，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sup>⑯</sup>

第四，深刻认识列强的侵略本性。郑观应的西学观的难能可贵处还在于，在全面检讨中国传统体制之不足，全面学习西方富强之道的同时，丝毫未走上崇洋媚外之路，而是时时处处洞察外国列强的侵略本质，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极为愤恨。他说：“夫洋务交涉之事甚繁，约其大纲，君民两大端而已。如杀伤、斗殴、焚毁、抢劫、占产、拐贩、辛工以及碰船、碰车诸案，皆事之小者关华民生计者也。侵越疆界，偷漏税款，违例便己，辟埠通商，以及传教建堂，游历杀伤诸案，皆事之大者，关系我国安危者也。西人舟车所至，每以语言互异，律法不同，利己损人，任情蔑理。入国不问禁例，入乡不知土俗。在租界外创办之事，亦不禀准当道而后行。惯以恫喝之词，势迫力成，否则勒赔巨款。是以猜嫌易起，动至激成巨案……我之待西人如此之厚，彼之待华人如此之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sup>⑰</sup>

学习西方是为了反侵略，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这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商战论中。他认为，“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

民口受欺凌。”<sup>⑱</sup>“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蔽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sup>⑲</sup>“习兵战不如习商战。”<sup>⑳</sup>

针对列强每一种侵略行径，郑观应都具体提出建议，以期中国在商战中取胜，例如，他提出要抗击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凶猛势头，政府应该在政策上对中国商务大力扶持。他说：“今中国虽与欧洲各国立约通商，开埠互市，然只见彼邦商船源源而来，今日开海上某埠头，明日开内地某口岸。一国争，诸国蚁附；一国至，诸国蜂从。滨海七省，浸成洋商世界；沿江五省又任洋船纵横。惜中国政府未能惠工恤商，而商民鲜有能自置轮船，广运货物，驶赴外洋，与之交易者。或转托洋商寄贩货物，而路隔数万里，易受欺骗，难期获利。”<sup>㉑</sup>

二、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郑观应向西方学习的理论观点有三方面重要特征，深刻性和科学性，善于抓住列强富强之道的关键，即科学精神和近代政治体制；全面性和系统性，全方位对照中国的各个领域，有针对性的提出中国值得学习之处和改革中国的方案；对列强侵略本性的清醒认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抗侵略的不屈斗志。

今天，距郑观应发表《救时揭要》已近一个半世纪，距《盛世危言》第一版问世亦一百余年。郑观应的著作实际上是早期针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经典性理论著作，或可称之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古典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对照郑观应的主要观点和立场，对照现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不能不深感惭愧和不安。现在，中国在许多方面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向西方学习仍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当前的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主流观念中，在我看来却有三大致命问题：浅薄、片面、缺乏基本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

浅薄性。表现之一是，在物质方面，只注意学习或引进外国资本、技术、设备产品、生产线之类，至多注意学习管理经验，却极少像郑观应那样，深入研究西方富强的根本性原因。在理论和知识方面，大量出现的是照抄照搬国外名家的理论观点，似乎只要搬来某种权威理论，就能解

决中国问题了，却极少考虑，这些理论观点，似乎只要搬来某种权威理论，就能解决中国问题了，却极少考虑这些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即其由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历史、人文条件是什么，其中与中国的差距是什么，哪些适用于中国，哪些不完全或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片面性。重要表现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事论事。或只强调经济现代化，或只强调科技现代化，或只强调物质生活水平为标准的现代化，或随着国外某种思潮的兴起，把国外现代化中的某一点当作拯救中国的绝对真理……在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极少看到像郑观应那样系统而全面的、涉及几乎全部领域的研究。

缺乏甚至放弃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在中国刚刚入世的今天，在理论界和实业界中盛行的一些思潮颇令人担忧。例如，全面接轨论，只讲中国适应服从，不讲中国自身利益和需要，丝毫未意识到：此“轨”在实质上是主宰世界经济的列强所制定的，并在主要方面于其有利的“游戏规则”。又如：只顾眼前利益，只要能生存下去，甚至可以置经济的民族性于不顾。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我国汽车工业的争论。

在中国汽车工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认为，中国轿车的开发设计水平与国外差距甚大，在资金、技术和人才都处于劣势情况下，中国汽车工业别无选择，只能做外国厂家和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为外企组装零件及生产外国品牌车。至于创立品牌，开发设计，那是跨国公司的事，中国企业还达不到那么高的层次。如果硬要追求，只能自找痛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汽车工业将无国界，中国应该自动纳入世界汽车分工体系中。如果再提自主开发，民族品牌，不仅显得观念意识落伍，而且会被世界汽车行业所抛弃，得不到任何利益。<sup>②</sup>

令人不安甚至愤怒的是，这种意见居然占据了主流地位。《经济日报》在2002年4月10日就以“民族汽车工业：是不能也，非不为也”的大字标题，公然发表文章，对中国民族汽车工业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加工厂的论调予以支援。但今日毕竟尚有公理在，有识之士已对此痛击道：经济全球化不等于世界大同，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如果中国只满足于做跨国公司的下游工厂，不搞自主开发，中国的汽车企业就只能被动地卷入“全球化重组”中，

而这个重组是跨国公司从其本身利益出发而进行的。一位元工程院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技术的独立，就没有经济的独立，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随着知识和技术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sup>③</sup>

今天的实际生活表明，纪念郑观应，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特别需要重温郑观应，回归郑观应！

### 三、升华先贤

但仅仅回归先贤是不够的。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自强”开始至今，历140年，中国仍未根本扭转“敌强我弱”局面；同时“列强”的“现代化”又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两方面的基本事实向今人再次提出了“思想革新”的历史要求。有两个问题尤值得考虑。第一，研究160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和思想理论的发展变化，总结经验教训。第二，研究当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新形式新变化新动态，对照中国国情，重新反思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和举措。

160年来，中国的现代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展开，是离不开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个重要内容的。这种学习，总体思路以“现代化”已经成功的外国强国为榜样和参照系。基本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想避免丧权辱国，只有效法先进强国。于是，从变法维新到“以俄为师”和效法欧美，从学习“苏联老大哥”再到努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就这样展开了。但是，在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的开端，历史发展和实际生活向人们提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重大反思的要求。

#### 反思基于如下原因：

其一，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终结：人们都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生产是依靠不可再生的能源和原料为基础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藏，丝毫不能短缺。西方国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生产总量越来越大；西方国家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料也越来越多。没有巨量能源和原料的供给，现代化的西方一天也维持不了。但是，地球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据权威人士估计，可以把握的世界石油蕴藏量约为1800亿吨。以1995年世界石油开采量33.2亿吨计算，石油储备大约在2050年宣告枯竭。天然气方面，如果年开采量维持在2300兆立方米，现有储备将在57年至

65年内枯竭。煤炭储量较为丰富，但按现有开发水平，也只约可供应169年。在能源和原料供给的刚性约束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再长期延续。与此同时，大量消耗资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大量产生有害废弃物，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环境，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不容继续下去。这就明确宣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取向绝非人类社会的美好天堂，它只是人类历史中极为短暂的一段插曲。

其二，西方国家思想界对现代化的反思：在西方社会思想界，对工业革命以来，以“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反思已形成强大思潮，出现了一批具有深刻的、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发生革命性挑战的理论。这些思潮、理论不仅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已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曾经获诺贝尔特别奖的德国学者赫尔曼·舍尔认为：我们的星球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相对于稳定的太阳能量流。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以及宇宙射线，它是开放的；相对于生化资源的潜力，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资源，它是封闭的。只要世界经济建筑在这个有限的能量与原料基础之上，那么它注定只有一个倍受局限的前景。这里有两个无可辩驳的理由：其一，生化资源终会枯竭；其二，在生化资源转换的同时，我们这个星球有限的生命要素—水、土壤、空气和地球大气层—必然会遭到过度使用、损耗以至破坏。舍尔认为：生化能源基础使世界得以步入繁荣—但同时也使其走向覆亡。世界文明只有不遗余力，立即转向采用可再生的，同时是自然可以负担的资源，摆脱对生化资源的依赖，才可以从已经存在的生化资源陷阱中逃脱出来。<sup>④</sup>

其三，中外资源禀赋与世界格局：对中国来说，资源与环境状况要比“发达国家”恶劣得多。按中国科学院的《中国国情报告》判断，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将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化若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走下去，无疑是死路一条。

其四，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近代中国有4亿庞大人口，80%以上是农民，不可能被弱小的城市工业所吸收，在百余年的近代历史中，产业工人只有二百余万。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国际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中国的侵略，不但使中国不能主要依靠世界市场发展现代工业，连狭小的

国内市场也多被侵占。所有这些都使中国难以走上西方式的以农民转变为城市和工业人口的现代化道路。时至今日，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基本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的出现和历史经验，向处于21世纪的中国人提出了以全新思维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历史使命。所谓全新思维是指：放弃以现行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或现代化道路的高级必经阶段的历史观，而代之以世界文明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历史观。放弃以大量消费带动大量生产并导致资本和资源大量消耗的快速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现代化模式，而代之以在保障国民基本生活水平基础上高度节约资源、充分利用人力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观。放弃利润最大化、市场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是最完美的观念，而代之以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利益协调兼顾基础上的经济运行机制。归根结底，时代的新特点向中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现代化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发达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考虑一个根本性问题：今后，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符合自己国情、世界既有格局以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方向、途径和规律应该具有哪些不同于“外强”的独特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这绝非否定向发达国家的学习，而是强调，中国绝不应该将西方国家已认识到重大问题的现代化道路，继续作为今后的方向。

在进行新世纪反思之时，我们倍感先贤郑观应之亲切。一个多世纪前郑观应为了有效抵御列强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极力思考解析中、外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在今天我们面临新的历史转变关头，郑观应的强烈民族责任感，对时代变化的深刻感悟和对中、外国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洞察，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极为珍贵的思想宝库和精神资源。我想，对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该是对郑观应先生的最好纪念。

#### 注释：

④李鸿章：《筹措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一。

下转第32页

变,只是批评中国传统观念与行为者,口气缓和不少。

-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
- ④ 郑观应《易言·自序》,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 ⑤ 见《曾文正公全书》书札卷十七,参见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998年版,第166页。
- ⑥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战》,十四卷本《商战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586页。
- ⑦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战》,十四卷本《商战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
- ⑧ 见《郑观应集》上册,第73页。
- ⑨ 见《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 ⑩ 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战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96-297页。
- ⑪ 郑观应:《盛世危言》十四卷本《商务二》,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07、609页。
- ⑫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十四卷本《商务一》,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5-616页。
- ⑬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十四卷本《商务二》,见《郑观应集》上册,第616-617页。
- ⑭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5页。
- ⑮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91页。
- ⑯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5页。
- ⑰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6页。
- ⑱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 ⑲ 郑观应:《盛世危言》,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67页。
- ⑳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72-275页。
- ㉑ 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01页。
- ㉒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学校》,八卷本《学校上》,见《郑观应集》上册,第247页。
- ㉓ 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日报》,十四卷本《日报上》、《日报下》,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45、349页。
- ㉔ 郑观应:《盛世危言·藏书》,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06页。
- ㉕ 郑观应:《盛世危言·教养》,见《郑观应集》上册,第480页。
- ㉖ 郑观应:《盛世危言》八卷本《自强论》,见《郑观应集》上册,第338-339页。

(本文作者是复旦大学文理学院教授、院长)

## 接第27页注解

- ② 夏东元先生认为此三书分别代表了郑观应维新思想的感性认识阶段、初步系统化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成熟阶段。参见夏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③ 《痛亡者无归论》,《救时揭要》,见《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 ④ “办洋人新闻纸于中土不宜开金矿论”,《救时揭要》,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 ⑤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 ⑥ 《易言》,“论开矿”,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 ⑦ 《易言》,“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页。
- ⑧ 《易言》,“论边防”,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 ⑨ 《易言》,“论火器”,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 ⑩ 《盛世危言》“西学”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见《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 ⑪ 《盛世危言》,“自强论甲午后续”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页。
- ⑫ 《盛世危言》,“西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
- ⑬ 《盛世危言》,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4页。
- ⑭ 《盛世危言》,“西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 ⑮ 《盛世危言》,“西学”附录“华人宜通西文说”,见《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 ⑯ 《盛世危言》“西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 ⑰ 《盛世危言》“交涉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页。
- ⑱ 《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 ⑲ 《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6页。
- ⑳ 《盛世危言》“商战上”,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 ㉑ 《盛世危言》“商务二”,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0页。
- ㉒ 《经济日报》2002年4月24日,9版。
- ㉓ 《经济日报》2002年4月24日,9版。
- ㉔ 参见[德]赫尔曼·舍尔:《阳光经济》,三联书店2000年版。

(本文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